

#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

##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周行易<sup>1,2</sup> 贾晓璞<sup>3</sup>

(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3;

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梅山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 娄底 417000; 3. 深圳福强小学, 广东 深圳 518038)

**摘要**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 它是以前湖南古梅山峒及其雒坛“桃源洞”为原型, 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 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 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关键词** 陶渊明; 桃花源记; 梅山文化; 隐逸文学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12(2011)06-0068-05

自东晋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诗并记》后, 随着《桃花源记》这篇美文的广泛传扬, 一千多年来, 人们寻找“世外桃源”的热忱有增无减。历代文人雅士见到一处类似“桃花源”的风景, 便吟诗题字, 把那里认做“桃花源”, 弄得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真实所在地究竟何在?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寻找“桃花源”无果, 有人则认为所谓的“桃花源”, 不过是陶渊虚构的而已,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 它又在哪儿? 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这个问题再做一次深入探讨。

### 一 “桃花源”不是纯虚构的产物

我们认为,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现实生活中曾经是存在的, 虽然《桃花源记》在细节描写上有虚构性, 但其故事核心内容应有其原型。如果说《桃花源记》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完全是陶渊明的凭空虚构, 那么, 有一个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即: 陶渊明为什么不以他所钟爱的象征隐逸文化的“菊花”来作为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文化符号, 而偏要用与“隐逸”毫不相关的“桃花”呢?

我们知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桃花”历来就不是隐逸文化的象征物。相反, 它与春天、性爱、生命繁衍有关, 表达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入世文化情怀。如:

1) 以桃符作春联。对此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有记载。王安石《元日》诗亦云: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2) 称爱情为“桃花运”。《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

魁》中即写道“也是他桃花运尽, 合当变更……。”

3) 用桃花比拟新婚女人, 寓意生殖繁衍。《国风·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因此, 对陶渊明不以“菊花”而是以“桃花”来作为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文化符号, 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在描写这个“世外桃源”时, 一定是有所本的; 也就是说, 是由一个既定的与“桃”或“桃花”有关的故事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 才使他以“桃花”为名写出了《桃花源诗并记》。由此可以断定: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绝非纯虚构的产物, 而是有其一定的现实生活原型的。

### 二 “桃花源”的原型只能是在今湖南的武陵山脉附近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曾论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并写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他认为《桃花源记》为“寓意之文, 亦纪实之文也。”<sup>[1]</sup> 陈先生认识到《桃花源记》有“纪实”性, 眼光独到。但陈先生认为“在纪实, 《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sup>[2]</sup>, 则未免失之偏颇。为论证“桃花源”的原型是北方的“坞壁”, 陈先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桃花源记》所明确规定的故事时空进行了消解: 在时间上, 为与“坞壁”产生的时代一致, 他主观地认为文中的“避秦时乱”是避“苻秦”乱而非避“嬴秦”乱; 在空间上, 为与“坞壁”所在的地点为北方一致, 则认为《桃花源记》之所以写故事发生地点在南方的武陵, 是文章结尾“但以牵连混合刘麟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 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sup>[1]</sup> 这样的解释显然很牵强: 其一, 《桃花源记》中除了写到“避秦时乱”, 还写了“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且《桃花源诗》已明确指出“避秦时乱”是避“嬴秦”

**收稿日期** 2011-09-12.

**作者简介** 周行易(1954—), 男, 湖南新化人, 湖南省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梅山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 湖南地方文化史; 贾晓璞(1970—), 女, 湖南邵阳人, 湖南省梅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 中国隐逸文学。

乱,时间上的规定很确定,非陈先生随意地将“苻秦”与“嬴秦”进行概念转换所能消解。其二,刘子骥(即刘麟之)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隐士名流,喜欢遍寻天下奇山异水,虽《晋书》和其时的笔记小说中有他到衡山采药的故事,却没有他到过武陵的材料,陶渊明即便是因在文章结尾写到他而不得不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南方,为什么不改在“衡山”而要改在“武陵”呢?“武陵”这个地名当时又是缘何从陶渊明的脑海中突然冒出来的?再者,刘子骥作为遍寻奇山异水的隐士名流,何处不可去?况且他是河南南阳人,离北方的“坞壁”更近,如果“桃花源”的原型果真是北方的“坞壁”,即便写到他,直书他在北方“坞壁”所在地寻访桃花源,在事理逻辑上也是成立的,陶渊明没有必要作此改写。

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立论,是因为他认为:一是其时坞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符合《桃花源记》的描述(实际上未必真的符合);二是坞壁所在的弘农或上洛地区有“桃源”、“桃林”的地名记载;三是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所获得的有关“坞壁”见闻。故他言之凿凿地说“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sup>[2]</sup>看起来证据和推理都能成立,但他的立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这个假设就是:南方的武陵地区其时不存在与“桃”或“桃花”有关的类似《桃花源记》所描写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即便有,陶渊明也无缘获得。通观陈寅恪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论述,他始终没有把这个假设的前提坐实,故他的结论当然不能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寻找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武陵”是唯一的地理坐标。《桃花源记》开篇处即说“武陵人捕鱼为业”,结尾处又说“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可知这个故事发生在“武陵郡”附近。如果承认“桃花源”有其原型,而又没有材料证明其时的武陵郡附近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那么,就应当以《桃花源记》文本所框定故事空间为依据,承认“桃花源”的原型即在武陵郡附近。任何离开《桃花源记》故事文本所框定的空间范围而另地寻找“桃花源”,都是不可取的。

“武陵”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关于武陵郡治历来有二说,一曰索县(今常德汉寿),二曰义陵(今怀化溆浦)。不管据哪一说,武陵郡都在今天的湖南武陵地区;另外,因“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化外之区,它也断不可能在当年武陵郡的治辖之内,故“桃花源”的原型只能是在武陵郡附近的其时尚未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地方。

### 三 当时的武陵郡附近存在一个与“桃”有关的“世外桃源”

与武陵郡毗邻的雪峰山脉中部东南侧,其时有一个神秘的化外之区,即梅山蛮所居的“梅山峒”。梅山峒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形态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完全一致。

(一)梅山峒是陶渊明所处时代武陵郡附近唯一一块未被开发的土地

从《桃花源记》可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块与世隔绝的“绝境”。在东晋时期,武陵郡附近的梅山峒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或被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控在了朝廷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只有梅山峒符合这个“要件”。

《宋史·梅山峒蛮传》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

宋熙宁年间开梅山后,宁乡知县毛渐作《宋开梅山颂并大序》云“宋有天下,一百一十三载。梅山之地,犹列溪峒”,亦说明在宋开梅山之前,梅山地区是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sup>[3]</sup>。

安化第七任知县吴致尧在所撰《太平开远桥记》中也追忆说:在开梅山前,此地人“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语言侏离……不能自通于中华”<sup>[4]</sup>。

梅山峒地域很广,相传有三十六洞。据《宋史·梅山峒蛮传》:“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其范围包括今新化、安化、冷水江、新邵、涟源、宁乡、湘乡、隆回、洞口、溆浦、益阳等县市的全部或一部分,新化、安化、冷水江为其中心。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梅山,以其地置新化县(冷水江原属新化),次年分置安化县,得“田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亩”。

从秦汉时起,历代中央王朝在梅山峒周边的武陵地区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东汉名将武威将军刘尚、伏波将军马援都战死在这里,三国时吴太常、潘浚、钟离牧、黄盖,包括西晋荆州刺史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等,都对这片土地征讨过,但中央王朝势力始终未能进入梅山峒区。清顾炎武《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十》云“安化县……秦益阳县地。自汉以后,皆为梅山蛮地。”虽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在今新化南部置有高平县(晋一度称“南高平”),但据1996年版《新化县志》所载的清邹文苏《高平考》:高平县在今新化县南一百里,仅“有九龙、灵真、长野、常福、金凤、太平、栗平、朴塘、石脚,凡十村”,其范围很小,可见新化县的主体区域并未涵括在内。昔人编新化县志为使县史不间断,或说新化曾属长沙郡、邵陵郡或益阳县,或说新化曾治高平,并以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中首次出现“梅山峒蛮”为由,说梅山峒从其时才被梅山蛮所占据,到宋熙宁年间收复,皆属于史无稽的主观之词,不足信。

梅山峒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文化黑洞”,在宋以前,它不见于任何史籍。对中国地理记述颇详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它也没有记载。《水经注》在记述资江流域时,写到邵阳便戛然而止,接下来即写益阳段,而梅山峒核心地区今新化、安化地段竟然是一个空白。这样一块广阔的区域,长期分离于中央王朝版图之外,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而正是由于这个“奇迹”的存

在,为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提供了可能。

#### (二) 梅山峒的社会形态与《桃花源记》描写的完全相同

相传梅山峒蛮为盘古后裔,春秋时称“荆蛮”、汉称“武陵蛮”(五溪蛮),南北朝、隋时称“莫徭”。所谓“莫徭”,就是《桃花源诗》中所写的“秋熟靡王税”的意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4 载“‘莫徭’者,自荆南五溪而来,居岭海间,号曰山民,盖盘瓠之遗种。本猿獠类,而无酋长,随溪谷群处,斫山为业,有采捕而无赋役,自为生理,不属于官,亦不属于岗首,故名‘莫徭’也。”

宋熙宁五年开梅山后,吴居厚由王安石派遣到新化来推行“新法”,《全宋诗》收了他为纪念此行作的《梅山十绝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寻溪小径多盘诘,车马初来路欲迷。”“莫道山中无礼乐,百年风俗自相承。”“自道生来为饱足,不知世上有荣枯。”“平日膏腴万顷田,开耕今说蔡侯先。”

这简直就与《桃花源诗并记》中所述的如出一辙。可见古梅山峒区,实乃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理想社会之原型。

#### (三) 梅山峒古代确有“避秦”的传说

梅山峒区地形复杂,形势险峻,地理隔绝,自古民风彪悍,中央王朝力量未能到达,因而成为秦时“避秦”和历代流民“避难”的绝佳处所。

新化奉家山属古梅山峒的核心区域之一。当地奉姓家族清代的四修谱牒《序》中有这样一节记述“吾族本姓嬴,自吉公而易姓,至弼公……递传献公生二子,长名渠梁,即秦孝公也,次名季昌,乃吾易姓之鼻祖也。因孝公用商鞅,坏古制,开阡陌,私智自矜,刑及公族。我祖睹极臣之乱政,痛旧典之沦亡,逆鳞累批,爰鞅犯楚,效采药遗踪,潜隐于濠,易姓为奉,更名吉。”<sup>[5]</sup>便提到了“避秦”事。

虽奉氏族谱《序》所云秦孝公之弟季昌易姓潜于濠的史实还有待证实,但此《序》作于清代,而其时地处僻隅,文化落后的奉家山奉姓,大可不必标新立异,于全国奉氏家族族谱之外另立一族源,当然也不可能像今天的风气一样,出于争旅游资源而故意附会,故此记述必另有缘由。有学者认为奉家山奉姓本瑶人,果如此,或在开梅山后,他们迫于民族歧视压力为生存计而改族为汉时,托季昌之名把本族“避秦”的历史糅合到汉族奉姓族谱中来也未可知。

清同治年间所编纂的《新化县志》中,收录了一篇明代陈长炳的《游鼓台山记》,这篇游记中也有这么一句话:“……相传秦时有冯君者避乱潜身于兹……后人构天云庵以祀之。”说明梅山峒“避秦”的传说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迟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且不限于奉姓家族。

梅山峒之“避秦”传说应当产生得更早。上所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4 云“‘莫徭’者,自荆南五溪而来”。“五溪”属古武陵地区,秦王朝曾在此建郡。据《元和郡县志》云,秦黔中郡治,在今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秦置黔中

郡,主要是从军事、政治上加强对巫、黔中及江南地区的控制。梅山峒之“莫徭”(至少有一部分)当是由秦在五溪地区建郡后逃过来的,梅山峒所传“避秦时乱”或即源自这次历史变故。

以上材料可作为《桃花源记》中“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的最好注脚。

#### (四) 梅山峒与“桃”有关

在梅山峒区,有设雉坛演雉戏的习俗,雉戏布景扎的就是“桃源洞”,如邵阳向家坛的中门上便书“桃源洞”三字。“桃源洞”里安放的是雉公、雉母神像。在梅山蛮的传言中,雉公、雉母即伏羲、女娲。可见梅山峒区的“桃源洞”雉坛流传甚久远。

1996 年版《新化县志》载:宋开梅山时梅山蛮信“梅山教”,祀奉“三洞桃源”。所谓“三洞桃源”,指“桃源洞”中的另外三位女神,即“三霄娘娘”,亦称“桃源三姐妹”。其三姐叫洞霄(也称水霄)娘娘,她放荡无羁,轻浮风骚,爱梳妆打扮,爱打情骂俏,为屈原《山鬼》中女神之原型。

在“庆娘娘”的雉戏中,“桃源洞”又被暗示为女阴。如“大宫和会”是梅山师公的主要法事之一,俗称“唱娘娘”,其科仪本中就有把“桃源洞”暗示为女阴的唱词和对白,整个雉戏充斥着原始生殖崇拜内容。这与“桃花”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女人和生殖繁衍有关是一致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梅山师公的《上洞桃源科》等科仪本中,还赫然有“避秦”的内容“只为秦王填东海,北筑长安万里城,万民躲入桃源洞,寻得桃源好避秦。”梅山峒雉坛“桃源洞”之所以有“避秦”内容,是因为在梅山峒蛮的意识中,雉坛中的“桃源洞”与现实中的梅山峒是相对应的;而现实中的梅山峒,正是一个没有王化,在历史上有过“避秦”故事的地方。

古梅山峒雉坛中的“桃源洞”,可以说即陶渊明以“桃花”名《桃花源记》的缘由。

#### 四 《桃花源记》的基本素材来源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做官经历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早年曾在武冈做过县令。据《晋书·陶侃传》,陶侃任武冈县令的那年是西晋永康元年(300 年)。

武冈与梅山峒接壤,其边界与梅山峒的地盘成犬牙交错之势。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中央政府在荆州郡南部置武冈、建兴、都梁三县。建兴县治在今武冈市马坪乡田塘村和洞口县尧王村;都梁县治在今隆回县桃花坪镇;武冈县治在今武冈城区,治域包括资江上游、夫夷水中游,巫水中上游流域的广大地区。西汉时期,巫水流域属酃城县,归武陵郡。今洞口、隆回北部,即为古梅山峒区。

西晋的武冈县是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县,一旦苗瑶民众发难起事,县令就得在与梅山峒区犬牙交错的崇山峻岭

中奔走处事,往往两三天才能赶到目的地。而且,常常此波未平,另波又起。陶侃的前任县令就是因不堪忍受这种境况而自卸乌纱帽溜走的。陶侃对梅山峒区未被王化的情况一定十分熟悉,对这段为官的经历也应该很难忘怀。后来陶侃做了荆州刺史,又率军攻打过梅山峒蛮,他对梅山峒的记忆一定刻骨铭心。因此,他应当会把这个神秘的梅山峒作为故事说给自己的儿孙听。世代相传,陶渊明完全有可能获得这个素材。

陶侃任武冈县令是他人生也是陶氏家族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故后来陶氏家族把邵阳武冈作为他们撰修族谱的起点。彭泽县文化馆 1983 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定山陶氏族谱》载“一世陶侃公,居饶州、邵阳,三世敢公,由邵阳迁居柴桑……四世渊明公……”。陶氏家族如此看重这个地方,则陶渊明获得梅山峒区的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另外,《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缘溪行”的地理状貌,同武冈与梅山峒南部接壤处的地理状貌也非常符合。

早在 1992 年,湖南学者马少侨先生即撰文说“梅山蛮聚族而居,由一个家族组成一个背山面水的村落称为寨,也称为院子。……寨(院子)与寨(院子)之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生产帮助,守望与共,谓之峒。峒与峒之间的两山夹水之处曰水口,蓄着密集的风水林,为峒与峒的分界线,其管领权属于上游溪峒。顺着一道贯穿着若干个峒的溪流流域所有的峒寨,一般都是近亲或姻亲关系。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社会组织称之为溪。大抵一个寨(院子)为一个家族,一个峒一个房族,一道溪为一个宗族。……晋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说渔舟‘沿溪行……忽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则豁然开朗’。所指的小口就是水口。通过这个水口,进入另一个部落(宗族)或者氏族(房族)的领地。”<sup>[6]</sup>

我们认为,马少侨先生的论证是正确的。与武冈毗邻的原属梅山峒边缘的绥宁县至今还有“水口”、“梅口”地名;洞口县亦或即得名于它是梅山峒的入口;更有奇者,与洞口接壤的隆回县城所在地自古就叫“桃花坪”,从武冈县城有一条小溪河(赧水)通向它。而宋熙宁五年开梅山后建新化县,亦在绥宁到洞口之间建了“武阳”、“关峒”二城<sup>[7]</sup>。可见这一带是进入梅山峒的重要隘口。

因此,我们认为《桃花源记》所写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很可能写的便是这个地理区位。而“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则是写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从桃花坪一带即梅山南面的某个“水口”进入梅山峒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开篇这样描写,其材料当来自他曾祖父陶侃对武冈与梅山峒接壤处的地理状貌描述。又,武冈治辖的巫水流域原本属武陵郡,且“武冈”与“武陵”一字之别,“冈”与“陵”又义通,或陶侃所说故事中的“武陵人”本来就指“武冈人”。

## 五 “桃花源”不应指梅山峒区一个很具体的自然村落

然而,我们不认为整篇《桃花源记》都是写实的。陶渊明没来过湖南,《桃花源记》并非郦道元《水经注》那样的地理游记散文,虽其原型有“纪实”成分,但也非今天意义上的纪实小说或报告文学。陶侃虽在武冈任过县令,却没有进驻过梅山峒区,他对毗邻的梅山峒区的情况是道听途说的,其认识是整体的、宏观的、模糊的,他只知道山那边有这么个没有王化的神秘地方,因而只可能把梅山峒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印象说给自己的子孙听;这样,陶渊明所获得的关于梅山峒的素材,也应该是整体的、宏观的、模糊的,不可能是其中某一个村落的具体素材。至于《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是一个村落,那只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而已。《桃花源记》描写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应来自陶渊明的文学想象,它们都只是中国古代农村自然村落的很普遍景物。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孤立的自然村落也很难隔绝于中央王朝势力之外。事实上,当年的梅山峒区也不存在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村落,其中的村落与村落皆通过一个个“水口”相连,都是广大莫瑶经常出没的地方。梅山峒区众多的自然村落的自然风貌和人文背景也是基本相同的。

因此我们认为,《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应指当时的整个梅山峒区,而非局限于其中的一处较小的自然村落。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其中某个自然村落的景物与《桃花源记》描写的相似,就说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当然,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发,把今天古梅山峒地区的某个或某几个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自然村落说成是“桃花源”,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大桃花源的一部分。这比把其他地方的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自然村落说成是“桃花源”,更接近事实,因而它们也更具有旅游开发价值。

## 六 《桃花源记》的创作动机和成因

陶渊明最初获得“梅山峒”素材的时间应当是在他童年时代,而他创作《桃花源诗并记》是在晚年。为什么他要到晚年才以梅山峒的素材来写《桃花源记》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时他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已彻底绝望,他要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美好社会理想;而其直接诱因,是他获得了同时代人刘子骥的“衡山采药”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笔记小说素材。

文中所写的“刘子骥”实有其人。有关刘子骥的史料见于《晋书·隐逸传》、《世说新语·栖逸》及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晋书·隐逸传》记载比较详细:

刘驥之,字子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驥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囿,一囿闭,一囿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囿中皆仙灵方

药诸杂物，麟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麟之固辞不受……。

陶渊明曾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以上提到的“车骑将军桓冲”是桓玄的叔父。桓冲请刘子骥为长史，“麟之固辞不受”，这个经历对于桓冲来说也是相当深刻的，他有可能在其家族中说到刘子骥其人其事，故其侄子桓玄有可能知道。而当陶渊明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后，桓玄见陶渊明与刘子骥性情相近，亦有可能对陶渊明说起刘子骥的故事——当然，陶渊明也可能是从另外途径获得了这个素材。刘子骥虽是南阳人，但他这个奇幻的采药故事是在湖南衡山发生的，这就激发了陶渊明对他曾所听到的同样奇幻的湖南梅山峒故事的联想，由此产生创作冲动和灵感，结合他所熟知的梅山峒素材，写成了亦真亦幻的《桃花源记》。

此外，当时一些记载仙幻内容的笔记小说也是促使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原因。

魏晋时期，亦真亦幻的笔记小说十分盛行，陶渊明掌握了不少这样的故事素材。如署名为陶潜撰的《搜神后记》载：

襄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东晋刘敬叔的《异苑》载：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

这些笔记小说的故事素材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亦很接近，有些句子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对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陶渊明还得知了晋咸康中高平令文丘归隐梅山峒之文丘山的故事。据说高平县令文丘因不满现实，隐于此山，在此得道成仙，故后人名此山为“文丘山”或“文丘山”。这则故事在晋代流传很广，成书于晋代的《湘中记》、《湘川记》等都有记载。文丘和陶渊明皆为晋之县令，二人皆因不满现实而归隐，陶渊明闻文丘故事时应心有所触动，故这则故事亦或是促使陶渊明最终把《桃花源记》中的理想社会定格于武陵附近的梅山峒的又一原因。

综上所述，《桃花源记》并非陶渊明的虚构之作，它是武陵郡附近的古梅山峒为原型，由刘子骥到衡山采药的经历及当时的另外一些仙幻故事素材引发，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千古杰作。而古梅山峒区，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桃花源记考证 [J]. 清华学报, 1936(1): 11.
- [2] 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 版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 [3] 李抱一. 开梅山考 [EB/OL]. 梅山网络. www.mei-shan.com [2011-03-02].
- [4] 邓显鹤. 清道光. 宝庆府志·摭谈 [M]. 清道光 27 年.
- [5] 粟海, 粟利宇. 古“桃花源”新考: 陶潜《桃花源记》≠摩尔“乌托邦” [EB/OL]. 梅山网 http://www.mei-shan.com/web3wz/shownews.asp?newsid=1060.
- [6] 马少侨. 楚辞新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43-144.
- [7] 脱脱, 等. 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下·梅山峒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Cracking Mystery of Ancient “Peach Garden”

ZHOU Xing-yi<sup>1,2</sup>, JIA Xiao-Ming<sup>3</sup>

- (1. Research Centr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Hunan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Changsha 410003, China;
2. Research Centre of Meishan Culture,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3. Shenzhen Fuqiang Primary School, Shenzhen 518038, China)

**Abstract:** *The Peach Garden* was not a work of fiction. It was the literary works which regarded the ancient Meishan cave and the Taoyuan cave for Nuo Altar as a prototype, and was some note novel materials written by Tao Kan, Tao Yuanming's grandfather, according to many things what he had seen and heard when he was a Xian Ling and a literature work full of Tao Yuanming's disaffections to the black social reality of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peach garden” which *The Peach Garden* had described did not refer to one natural village, but the whole district of ancient Meishan cav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he Peach Garden; Meishan culture; reclusiv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范文)